

何应钦出长行政院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张 皓

摘 要 何应钦是国民党拯救其统治崩溃的“最后一张王牌”，同 1949 年进行的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存在密切关联。为了“备战言和”，蒋介石、桂系两大集团找出可以接受且受中共欢迎的何应钦担任行政院长。桂系认为同他合作可以重演以前联合打败孙传芳的历史，蒋介石认为通过他可以掌控和平谈判。为了争取“合情合理的和平”，何应钦竭力组织“和平”内阁和谈判代表团，拟定谈判要点。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下，何应钦拟调节蒋桂矛盾、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划江而治”的“和平”，是根本不可能的。他除了同蒋介石集团决裂、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并无其他路可走。国民党企图通过何应钦这张“王牌”达到挽救统治崩溃的目的，完全不可能实现。

关键词 国共和平谈判；何应钦；蒋桂之争；“合情合理的和平”

中图分类号 K2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6)05-0045-12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LSA024)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到来，国民党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中”^[1](P1360, 1361)。为了拯救统治的崩溃，国民党发起“和平”攻势，并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何应钦。何应钦，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重要军政人物之一。蒋介石下野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蒋介石认为要与桂系(李宗仁)合作，就要有“桥梁”，这个桥梁就是所谓“性情和平，得人同情”的何应钦，他“出而组阁，舆情之洽为历届出长行政院者所望尘莫及”^[2](P28, 35-36, 40)。那么，国民党“最后一张王牌”是怎么打出来的？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又是如何调节蒋桂关系和处理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一方面，学术界虽然围绕北平国共和平谈判探讨了许多问题，却未有专文研究何应钦与和平谈判的关系^①。另一方面，熊宗仁在其所著《何应钦全传》中谈到何应钦对和平谈判的态度，批评李宗仁“竟然选择蒋介石嫡系中最不敢冒犯蒋，而且‘反共’如蒋一般坚决的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认为何应钦“组阁拒和”，并认为和平谈判最终破裂之因固然是国民政府原本就无诚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而何应钦充当了“以蒋介石为首的那股特别顽固的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言人”^[3](P417, 427)。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基于这两方面，下文专门探讨。

① 关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就国民党政治人物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关系之研究来说，主要体现在：(1)蒋介石。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以 1949 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张皓《蒋介石对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应对》(《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2 期)。(2)李宗仁。季云飞《传统政治心理制约与李宗仁拒签国内和平协定》(《学术论坛》1993 年 4 期)。(3)张治中。主要有王宗荣、田青刚《张治中与北平和平谈判》(《历史教学(高校版)》1989 年第 8 期)、张小满《张治中与北平和谈》(《南都学坛》2003 年第 6 期)、张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张治中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苏区研究》2024 年第 3 期)。(4)孙科。张皓《孙科与国共和谈》(《学术研究》2011 年第 12 期)。(5)陈立夫。张皓《国民党 CC 系对国共和谈问题的态度(1948-1949)——以陈立夫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对于主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北平国共和平谈判的何应钦，则无研究。

一、“最后一张王牌”: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

何应钦是怎么出任行政院长的呢?这是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战略大决战展开后,担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却主张和平谈判。1948年11月2日,蒋介石指责何应钦失败主义情绪严重,“不能不令人痛愤”^[4](P348)。11月16日,《华商报》称何应钦与李宗仁、白崇禧“正在活动着逼迫蒋介石‘下野’”^[5]。12月17日,李宗仁对蒋表示同意出面“倡导和谈主持大政”,条件之一是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来“主持和谈”^[6](P264)。何应钦亦准备好改革方案和整军方案,但因蒋介石反对而不得不表示无意接任行政院长。李济深12月26日北上前,何应钦派代表“表示不愿再帮蒋”,李济深劝告其如能“反正在起义,立功赎罪,将来不独可免为战犯,还可以参加新政协”^[7](P207)。

1949年1月9日,何应钦突然“来沪割治痔疾”^[8]。白崇禧得知蒋介石1月21日下野,建议李宗仁改组行政院和军队指挥系统,以张治中为院长负责求和,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6](P271-272)。1月24日,李宗仁到沪同何应钦商定尽可能“跟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同时,继续准备防御战”,何应钦“协助指挥防守长江一线”^[9],双方企图重演1927年孙传芳军队袭击南京时合作扭转危局的历史。

2月8日,李宗仁又到沪与何应钦会商。2月14日,何应钦由沪抵宁强调和平,称“和平不仅中国需要,且是全世界所切望”^[10]。李宗仁促请他出任国防部长负责“管束军队,俾可不影响和平”^[11],蒋介石批评他“偏听桂系之宣传”^[12](P62)。

白崇禧推荐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2月19日,他到宁对何应钦称:如其“不担任行政院长”,则他“不回武汉”^[12](P62)。何应钦飞沪同各方交换意见后返宁同白崇禧深入交谈。李宗仁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以何应钦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因为他“有能力得到黄埔系军人的支持,并有可能影响蒋介石”^[13](P136)。有人称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是白崇禧“过去两天跟蒋介石会谈”^[14]之果,蒋介石同意之因在于他与白崇禧、何应钦二人在和谈原则上达成一致。蒋经国称李宗仁对于行政院长人选“已属意于何应钦”,因为李宗仁“亦无非采‘过渡’办法,因彼尚未能提出适当人选也”^[15](P171,177)。2月20日,何应钦要求司徒雷登“帮忙促请蒋介石出国”^[16](P75),称如果美国“能尽一切力量邀请蒋介石访美”,就是给予中国最好的援助。他批评蒋介石极力干预代总统权力,强调“只要拥有三个月的充分军事权力,就能有效地加强军队防守长江”^[13](P142)。2月26日,蒋介石记载:李宗仁“必欲调换孙科院长职而强何敬之继任”,居正“以党之元老资格反对其提案,院长应由中央常会推选,如李代总统不依照此程序,而擅提立法院则不合手续,粤中自有异议,且启分裂之端”^[12](P69)。

3月4日,何应钦对记者谈“不但中国需要和平,全世界都需要和平”,“李代总统和政府是确有和平诚意的”^[17]。此前一日,吴忠信、张治中携李宗仁函“请示”蒋介石,要点为:“一、和平条件及其限度。二、行政院长易人问题。”3月8日,李宗仁“照准”孙科辞职,提出何应钦、顾孟余、阎锡山、居正、吴铁城五个人选,要求蒋介石“决选其一人”^[12](P78,83)。这五人中,李宗仁属意居正,白崇禧屡荐何应钦,立法院推举顾孟余。桂系商定“以顾孟余为第一人选,何应钦为第二人选,居正为第三人选,依次提出征求”^[18](P60)。组阁有两种可能:“(一)何任行政院长,顾任副院长兼教育部长;(二)顾任行政院长,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19]但是,顾孟余以“蒋在幕后控制,和战都无办法”^[18](P60)而拒绝。于是,桂系“特别着重”何应钦^[20](P789),因为:第一,行政院长人选须是蒋桂双方都能接受的,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人”,同桂系“有过悠久的共事历史”^[21](P192)。第二,必须是“诚意主和者”,“诚心愿意与李宗仁合作推进和平政策”^[22]。何应钦对李宗仁表示如希望“协助和平工作”,他“当义不容辞”^[23]。第三,李宗仁需要何应钦“在军政军令方面之协助”^[24],负责整编军队以求和平。第四,何应钦“会得到广东将军的合作”^[13](P178)。总之,李宗仁身边“人士”宣称:新内阁必为“和平内阁”,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均将为能致力和平政策之人士,俾能协助李代总统,完成谋取和平之任务”^[24]。

3月9日,蒋介石约吴忠信、张治中“研讨行政院长人选与和谈代表问题”^[12](P83),强调“为什么一定

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何应钦“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并说：“(1)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宜。”^[20](P789,790)蒋介石的幕僚李惟果列举由吴铁城担任行政院长的几个因素：其一，吴铁城目前唯一目的是“继续而有效地抵抗共产主义”。其二，总统是广西人，行政院长就“须来自广东”，吴铁城恰恰是广东人。其三，吴铁城得到蒋桂双方的信任，可以弥补双方裂痕^[13](P129)。因此，何应钦“对出任行政院长颇感犹豫”^[16](P86)。

3月10日，吴忠信、张治中向蒋介石转告何应钦“坚决拒绝，不参加行政院”。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未免太过”^[12](P84)，如何应钦不能接任，就提名居正。张治中向蒋介石指出：你如不同意何应钦出任，内阁就组不成，李宗仁“把责任推给你”^[20](P790)。蒋介石一度反对之因，在于担心何应钦“无主见无定见，甚为将来和谈成败时任人利用”，即担心为桂系所用。但是，如果何应钦“不就”，李宗仁就“命居正组阁，更为危败”，因为居正昏庸奸猾，“不知其羞耻”。于是，蒋嘱咐吴忠信、张治中携其信函“劝何入阁”^[12](P85,84)。信函声称“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毅然应命”，希望何应钦“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25](P213-214)。在3月12日何应钦、王文湘夫妇六秩双寿之时，蒋介石亲笔写下“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字祝寿。

也就是在3月12日，吴忠信、张治中二人同白崇禧、顾祝同到杭劝说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何应钦“终至允就”^[12](P85)。因蒋介石亲笔致函说他最“适宜”^[26](P443)，他“深感蒋谆谆劝勉之旨，再四思维，嗣复盱衡全局，以为分属党员及革命军人，身属国家，论战可团结内部之力量，谈和则可确守固定之原则。果能使旧属有所依托，并拯斯民于水火，则个人毁誉荣辱，自在所不计”^[27](P990)，遂答应出任行政院长。

何应钦向李宗仁提出条件：其一，行政院长须有权。由于总统与行政院长之间“权责不明，职掌不分”，要“实行责任内阁”^[28]，“行政院依照宪法规定，须向立法院负责，因此，行政院政策必须获得立法院多数委员之支持”。其二，对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即“对各友邦均须兼顾，俾能和协邦交，争取外援”。其三，和谈要依据蒋介石的指示。所谓和谈“必须公平合理；在此限度内，当不惜委曲求全，以谋永久和平，并应得本党中央之同意。如超越此一限度，或未得中央同意，内阁即无法执行此一任务”^[29](P99)。李宗仁同意“决根据宪法之规定，使何先生能做到责任内阁制”^[28]，但在咨文立法院提名中希望何应钦“必能适应时势之需求”，“为和平建国努力”^[30]。同样在3月12日，立法院通过对何应钦的提名。他在一次茶会上讲述他出任的经过：“自孙内阁辞职后，李代总统就在电话中邀我组阁，我回答他没有兴趣，当时并不加以考虑，因为我正准备去福州(杭州)养病。到三月十一日，张文白先生又来杭州，屡次劝说，我仍然表示目前困难不是我做得好的，后来又经过立法院同意。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民主阁揆要多数人支持，军人要奉公守法的，因此，我便答应下来了。”^[31]

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是因为“具有两项重要条件：(一)他可以调和宁穗间的心理矛盾。(二)他可以挑得起和战的千斤重担”，既“能战”也“能和”^[32]。前者是蒋桂权力争夺的一种缓冲做法，后者是国民党认为他是挽救统治崩溃的“最后一张王牌”^[8](P1153)。蒋介石担心他出任行政院长后同桂系沆瀣一气，但意识到“在和谈未定以前，则又不能不与桂系联系”^[12](P87)。何应钦声称自抗战结束后就“主张和平”，这次“受命组阁，乃跳火坑之举”；之所以“肯去跳”，乃因为“人民苦不堪言”而“必须谋求和平”^[33]。

可见，何应钦在国民党军战败的情况下主张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下野后，白崇禧主张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但蒋介石担心他完全站在桂系一边而反对。在确保何应钦听命于他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同意他接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这张“王牌”就是这样打出来的，中共洞悉何应钦是蒋桂双方唯一能接受的人选，指出他担任“联合国参谋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去美国洗了一次澡，又在内战扩大后以‘自由份子’面貌镀金归来”。美国支持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何应钦和李宗仁、白崇禧“同以美帝宠儿身份联成一气”。在淮海战役战败时，他们组建“白狐狸集团”(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来制造和平谣言，

“从事‘倒蒋救蒋’的阴谋”。蒋介石下台以后,他又“在蒋介石同意之下,继孙科之后宣布‘组阁’了”^[34]。何应钦担任行政院长的“企图很明显:(一)准备再战,以何来收拾七零八落的军队;(二)仍进行虚伪的和平;(三)蒋李矛盾,李图以何分散蒋之军权,而何又较为蒋及各方面所能承认之人物”^[35](P258)。总之,何应钦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何应钦称“无论任何一种职务,必定要得蒋先生许可,方可受命”^[2](P29)。

二、“用新人,行新政”:何应钦走马上任

何应钦作为王牌被打出来后,如何应对国共和平谈判?当务之急,他要组成“和平内阁”。

3月14日,何应钦宣布工作以稳定经济、谋取和平两项为主。他面临几个“重大的困难:(一)对共产党的‘和谈’问题,无法得到结果;(二)行政院各部人选问题,与李宗仁之间亦有距离;(三)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这几大问题中当属是“和”还是“战”问题最关键,因为关系“国脉民命”,何应钦“亦无法自主”^[15](P177)。有人指出:何应钦“恐难对于国共间和平有改善之望”,其任务“实际系在阻止李代总统对共产党作重大让步,并根据毛泽东八项条件,举行和平谈判”^{①[36]}。

由于“在现状下无人愿意出来任职”^[13](P185-186),何应钦组阁遇到困难。3月15日,他到南京称组阁须待时日。3月18日,他称:“我来南京已经三天,还不能提出阁员名单”,“这因为贤能之士多已疏散离京,用电话、电报联系,耽搁时间太长”^[31]。事实上,此事困于以下症结。

其一,欲组成“和平内阁”问题上,桂系和何应钦的希望落空。

李宗仁提出,何应钦要“使政府内部重新团结,与中共媾和”^[37],组成致力于和谈的内阁。何应钦也称“所组织之内阁,将为一和平内阁”^[38]。要组成这种内阁,最好是邀请2月北上敲开和平谈判大门的颜惠庆、江庸、章士钊三人入阁,有电称三人“均已被邀参加何应钦新内阁担任‘里层内阁’阁员(即行政院政务委员)。他们三人都颇受中共的尊敬”^[39]。李宗仁征求颜惠庆、章士钊任外长、司法行政部部长,二人一度表示如果新内阁为和平内阁,则可以考虑入阁。但随后,章士钊表示不能入阁。至于颜惠庆,何应钦到沪邀请,但是颜惠庆以“年事已高”而拒绝,仅“表示如和谈开始必要时,愿再为和平而努力”^[40]。关于江庸,他以“不愿因入阁,而使人误认飞平之行,意在觅取代表”^[41]而辞谢。

路透社上海3月14日电称:“何应钦的内阁虽然只有九个部长,但传何应钦正在计划成立一个决策的里层内阁,至少以不管部阁员九人组织之”,其中大部份是“竭力主张和平的人物”。除了颜惠庆、江庸、章士钊三人以外,“邵力子、张群、民社党的张君勱以及青年党的李璜都被认为是可能参加里层内阁的人选”^[39]。张群拒绝入阁担任政务委员,但是称如果何应钦坚持要求他入阁,他可答应,不过不能待在南京^[13](P188)。李宗仁本不想民青两党入阁,但由于李璜、张君勱表示愿意共同负责,决定何应钦内阁仍为“三党内阁”。何应钦称“尽可能劝说国民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参加行政院,以挽救国家目前的危局”^[41],但是组阁遇到两个挫折,一是“民社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37],二是颜惠庆拒绝入阁。

其二,在几个职位和几个人选上,蒋桂之间矛盾重重。

首先是副院长人选。舆论称黄绍竑为副院长,而蒋介石嘱咐何应钦不能任用黄绍竑,以中桂系“夺取行政院过渡之阴谋”^[12](P86)。黄绍竑不能出任,记者询问是否由张治中担任,何应钦回答张治中不能担任,因为“整个西北尚须张先生照顾”^[42]。何应钦要求外长吴铁城出任副院长兼外长,但是顾维钧指出吴铁城拒绝担任副院长,“因为这样他就不能同时继续担任外交部长”^[43](P99)。事实上,吴铁城不能入阁是因为何应钦不能回答他的两个条件:“对美国的友好政策不能改变”“和谈必须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尽可能维持反共力量”^[13](P186,184)。副院长人选同秘书长、内政部长问题交织在一起。李宗仁打算以

①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宣布和平谈判八项原则:“(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P1389)

黄绍竑任秘书长,以粤派军人李汉魂或原属西北军的薛笃弼任内政部长。蒋介石则属意黄少谷任秘书长,阎锡山系的贾景德任副院长。有人指出:“新阁名单中最为困难之人选,实为内长,因最初系属意于薛笃弼”,“以薛不允,复有邀李汉魂之说,惟旋更以已决定为秘书长之黄少谷改为内长”,随即“再度变更,仍由黄任秘书长,内长一职,则敦劝薛笃弼以副院长兼任”;如薛“坚决不允”,则由贾景德出任副院长,“内长可能为李汉魂”^[44]。黄绍竑拒绝出任秘书长,薛笃弼亦称“父母年逾八十,报亲日短,故无意政治”^[45]。最终由贾景德出任副院长。

其次是外长人选。在一定程度上,“组阁讨论以外交部为中心”^[41],李宗仁有意任用甘介侯,但遭到蒋介石坚决反对,甘介侯不得不称自己“从无参加实际政治之意”^[46]。于是,李宗仁和何应钦主张顾维钧,但张治中力主驻苏大使傅秉常以“向苏联表示友好”。李宗仁“担心傅的声望不高,经验不足,在驻外的老资格使节中间可能不受欢迎”^[43](P98)。直至3月19日,蒋介石敲定以傅秉常为外长,认为“能否发生微妙作用虽难断定,然亦不失为突击之举”^[12](P92)。何应钦也想通过任命傅秉常提高自己在中共和苏联眼中地位^[13](P194)。蒋经国则认为何应钦任命傅秉常为外长是其“第一重要措施”^[15](P177)。

再次,国防部长职位也很重要。桂系和何应钦打算加强国防部长职权,《中央日报》称“从前之国防部长仅系一事务官,军令均由参谋总长发布,新阁中之国防部长职权,将予增强,俾使全权指挥海陆空三军,以应付任何事件”^[47]。何应钦考虑自兼国防部长,白崇禧则想担任,蒋介石也反对何应钦自兼。到3月20日,白崇禧见自己不能继任,乃建议何应钦兼任。蒋介石仍然反对,结果徐永昌留任。

在组阁过程中公布了一份初步名单:副院长贾景德,政务委员张治中、张群、朱家骅、吴忠信,外长傅秉常,财长徐堪(蝉联),国防部长何应钦(兼),经济部长孙越崎(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教育部长李蒸,交通部长未定(但在广州的民生行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已被推荐,卢未同意),内政部长未定(何应钦正劝薛笃弼担任),司法行政部长未定(何应钦仍请章士钊考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蝉联),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蝉联),秘书长黄少谷(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副秘书长倪炯声(蝉联)^[38]。

这份名单中“蝉联”者四人,其余似乎按照何应钦遴选标准“地位之超然”“富于相当之资望”“尽量避免用旧人”^[48]来拟定。“接近何应钦之权威人士”解释:“何氏组阁之人选,首先避免任用私人,同时避免干预,予何氏以全权;强调和平,减轻党性,俾对中共无所刺激。”^[49]但是,这份名单有些理想化,至3月19日何应钦邀约的“知名之士”,差不多均已婉谢,“而愿与跳火坑、资格较低人才,又不合何氏理想”,“致新内阁迟迟不能组成”^[2](P43)。因此,他电话李宗仁“给予助力”。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叙述说:李当日下午五时即专机飞沪,“拟邀薛笃弼当行政院副院长,梅贻琦当教育部长,陈光甫当财政部长。二十日奔走活动的结果:薛荐贾景德以自代;梅不愿重作冯妇,并介绍杭立武来代替他;陈更不愿跳火坑,惟说刘攻芸在财经界可供驱策。二十日傍晚,李宗仁一行偕刘攻芸飞返南京,总算助了何应钦一臂之力”^[18](P61-62)。

李宗仁此次赴沪非以代总统而是以私人身份劝说陈光甫等人入阁,司徒雷登称他“是为要说服自由主义分子参加内阁而亲自出马的,如委派梅贻琦长教育部便是。这些乃由于共军的渐渐迫近所暗示的”^[16](P91)。按此,李宗仁竭力要组成一个“和平内阁”。所谓“自由主义分子”除梅贻琦外尚有陈光甫,中共希望他留下不要走。刘攻芸为银行家,蒋介石指责他投桂系。李宗仁此行后,“以‘停战谋和’主张作号召”^[50](P77)的何应钦内阁名单终于在3月21日晚宣布:副院长贾景德,政务委员张治中、张群、朱家骅、莫德惠、贺耀组,秘书长黄少谷,副秘书长倪炯声,内政部长李汉魂,外长傅秉常,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财长刘攻芸,教育部长杭立武,国防部长徐永昌,交通部长端木杰,司法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总计长庞松舟^[2](P44-45)。

从3月12日接任行政院长到3月21日的十天时间里,何应钦终于提出这份特色名单:其一,按照何应钦所说“用新人,行新政”的遴选阁员标准,有一些“新人”入阁。整份名单中,除院长、秘书长、副秘书长、总计长四人之外的“十六人中,新人占九,蝉联者七”^[51]。顾维钧称赞“除了个别例外,新阁是由较年

轻的成员组成,这些人都是公认的各界领袖”^[43](P9)。司徒雷登也称赞,何应钦“终于找到了一批比较年轻的人”入阁,“他们是清白的,有公益心的”^[52](P221-222)。但是,在九名“新人”中,“甚少过去未作行政官者,如贾景德、张知本、李汉魂、端木杰、贺耀组、莫德惠、杭立武等七人,即为走马灯式之调职。新人刘攻芸、傅秉常二人而已”^[51]。傅秉常是各派争吵的焦点,他出任外长被认为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更转向苏联以期与中共谈和”^[53]。但是,他并未就职,外长职务由次长叶公超代理,而叶公超与胡适、傅斯年关系密切。这样,表面上看对外政策转向苏联,实际上仍然保持对美关系。其二,何应钦、李宗仁打算组织“和平内阁”,却组了一个“和战”的“两面”内阁。虽然何应钦声称其内阁是“和平内阁”,但因“企图重建国民党的内部团结”而不得不在蒋桂之间达成妥协。李宗仁“愿意接受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蒋介石则称“不获得‘光荣的和平’即继续战争”。因此,何应钦内阁难免是“备战与谋和得同时进行”的两面内阁。有人指出,除何应钦外阁员中军人出身六人,李汉魂、徐永昌、端木杰三人“是管部的”,张治中、张群、贺耀组三人“是不管部的”。这说明,何应钦“并没有完全忽略了内战再激烈起来的可能性”,这样安排“是想在与中共和谈时加强他的军事地位”^[53]。其三,何应钦内阁既然是蒋桂之争的产物,对于国共和平谈判并无什么意义。何应钦内阁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CC系人物都被排斥于内阁之外,比如,内政部过去一向为CC系控制,现在则由李宗仁的亲信李汉魂出任部长^[53]。因此,美国认为“新阁的组成,在政府机构中减少并几乎完全消除蒋介石以前的影响”^[13](P200),李宗仁成功换掉孙科内阁,“获得了何应钦这位在军队中的权力和威望仅次于蒋介石的主要人物的合作和重大支持”,从而“不动声色地确立了中国自己的领导地位”^[13](P207)。然而,蒋介石“事实上控制着大部分陆海空军”、秘密警察和黄金外汇,因而“维持了他自己事实上和某种程度上干涉国家事务的权力”,在认为有必要时进行干涉。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阁的产生并无多大的政治意义”^[13](P199-201)。

的确,新华社在何应钦内阁宣布时即指出:何应钦自称为和平内阁“是否符合事实,既不能从他的‘内阁’名单来证实,也不能从他的宣言来证实”。李宗仁及何应钦内阁“今后究竟是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并藉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呢?还是借所谓‘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的名义,求得保全反革命势力、并掩护其继续战争呢”?证明这一点的时机,即将迫近,“只待举行和平谈判就可以见分晓”^[54]。

综合来看,如何组阁体现了何应钦、李宗仁、蒋介石三人之间的关系,本质在于要组成什么样的内阁,争执之点在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三个职位上。要组成真正的和平内阁,最好由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以及邵力子入阁。但是,他们以各种原因谢绝了。李宗仁打算由黄绍竑、甘介侯分别担任副院长、外长,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何应钦打算自己兼任国防部长,也遭到蒋介石的反对。本想组成“和平内阁”,最终却组成和战兼备的内阁。在紧要关头应该尽快组阁,然而组阁完成却长达十来天。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表示谈判可于3月15日以后开始,然而由于国民党内部之争不可能于这日以后开始。3月12日才确定由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已在事实上延缓和平谈判的开始日期。何应钦不可能在3月15日前完成组阁,截至此日南京政府不可能完成和谈准备。到3月24日,何应钦内阁才宣布就职,李宗仁亲自监誓,要求何应钦内阁努力于和平。

三、“划江而治”:争取“合情合理的永久和平”

那么,何应钦如何“为和平而努力”?如何主持和平谈判而争取“合情合理的永久和平”?

3月15日,何应钦回到南京称可望马上同中共展开和谈,这标志他正式开始“为和平而努力”。“政府首要之图,厥有四端”,即“争取和平”“革新军事”“革新政治”“安定民生”。就争取和平而言,他称“战事连年,烽火遍地,民生疾苦,达于极点”,因此祈求和平,实为全国人民一致之愿望,“本人以为惟有放大眼光,存最大之容忍与诚意,以求和平之早日实现”^[55]。他强调他要“尽力完成各项工作”^[56]。

何应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李宗仁共同“派遣政府和谈代表团”。何应钦提出代表人选“不但要能

履行诺言,维护政府及人民的立场;同时要为中共所接受”^[32]。他反对邵力子而主张张治中为首席代表,认为张治中“虽不可靠,但邵更左倾,与其用邵必将一面倒,不如用张或可予以影响”^[29](P101)。他要求章士钊为代表,章士钊表示“义不容辞”,“决以第三者立场,从中努力疏解,务使和谈臻于成功”^[57]。3月24日,行政院通过“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代表由李宗仁任命,何应钦副署。

在和谈开始前和进行中,何应钦竭力营造“祥和”气氛。3月27日,他下令“禁止非法逮捕”,对“过去没有严格遵守‘宪法’,致有非法逮捕的事情发生表示遗憾”,警告“将来不容再有这种不合宜的事情”^[58]。4月15日,他“批准有限度的释放某些政治犯”,释放令由司法行政部下发,各地方法院“开始通知监禁政治犯的各机关,如警察局、淞沪卫戍司令部、海军基地司令部、海港指挥所、空军后勤司令部、铁路警察及其他机关”。李宗仁1月下旬就发布释放政治犯令,但“被置之不理”;这是李宗仁的命令“第一次在事实上执行”,目的“是要在和谈中赢得自由份子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支持”。但是,释放令并不“包括其他触犯戒严令的较严重的人犯”^[59]。何应钦还调换南京警察厅长,而刘诚之在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时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蒋介石批评何应钦“竟不负责而照办”,呵斥他“不能改变其出卖黄埔之根性,恐终为桂系所牺牲”^[12](P109)。

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分崩离析,如何使其运作处理国共和平谈判,是何应钦面临的难题。他采取几项措施:其一,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回南京。何应钦主持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黄少谷等人参加的四次研究会,决定“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20](P791)。但是,这遭到蒋介石拒绝。其二,政府大员须坐镇南京。行政院会议决定和谈期间,各部部长及政务次长留在南京,行政机关及常务次长在广州。吴铁城声称:“政府机构仍然留在广州推行所有工作,一批杰出的部长及政务次长留在南京,只是一种窗口,向中共和人民表明政府寻求和平的诚挚心情。”^[13](P223)

何应钦和李宗仁成立一个机构,“指导”和平谈判进行事宜。在他上任前,李宗仁任命由张治中、何应钦、刘斐、张群、邵力子、吴忠信、孙科、吴铁城、朱家骅、钟天心组成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按下列原则起草谈判方案:“根据与中共达成的协议修改宪法;中共方面同意重新考虑‘战犯’问题;如有必要,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予以解散;在平等、合理的基础上改编军队。”^[13](P162)何应钦上任后,李宗仁授权“组成新的委员会”^[13](P187),由李宗仁、何应钦及“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20](P791-792)共五人组成,实际上由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童冠贤、孙科、张群、朱家骅、白崇禧八人组成。这个指导委员会具有“接受和谈代表团的咨询并赋有批准代表团可能拟出的任何方案的权力”^[50](P80),李宗仁、何应钦力图通过它掌握和谈是否批准、和谈结果的最高权力。蒋介石对此抵制而组成另一个委员会,国民党军报纸《和平日报》称“国民党为求党内对和平谈判意见一致起见,特组织委员会,负责研讨。此项委员会,非代表政府机构,而为党内交换意见之枢纽。委员中有孙科、张群、于右任、居正、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李文范、洪兰友等。交换意见之结果,随时汇呈蒋总裁核示”^[60]。

以上所言,就是何应钦所说“勉为其难”而完成的“各项工作”。何应钦作为“最后一张王牌”,企图通过和谈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他宣布,所要争取的和平“是合情合理的永久的和平”,因为只有“合情合理”,才能“奠定团结民主的中国”之基,才能“消灭内战”^[42]。这种“和平”,其原则包括“(1)民主政府;(2)经济的社会主义形式;(3)军队国家化;(4)个人自由;(5)平等”^[13](P188)。如何将这个原则体现在和谈方案中?他声称“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20](P792),却又称应以蒋介石元旦文告所列原则及中共八条原则“为和谈之基础”^[27](P1003)。“合情合理的永久的和平”五个原则恰恰体现了蒋介石的要求,何应钦同各派商定九点:“(一)商谈范围为如何保存国家元气,如何解除人民痛苦,如何拟定国家政策,如何建立政治制度,以谋长治久安,而不应再提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二)同意重订新宪法;(三)法统问题可以商讨;(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五)原则同意没收官僚资本,但须另行商拟施行条例办理;(六)原则同

意改革土地制度,但须另行商拟施行条例办理;(七)同意由将来政府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八)同意召开政协会议,并产生联合政府,惟在会议及联合政府中,国共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属于第三方面人士名额,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九)国民党政府代表抵平后,向中共提出于正式商谈开始前,就地停战。”^[61](P526-527)

这九点是这样出笼的:张治中至溪口同蒋介石“商谈和平谈判问题”,随后何应钦主持研讨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最后由指导委员会“订出九点与中共商谈的草案”^[50](P125)。前八点针对八条作出虽然“同意”但是“但须”“惟”的回答,第九点要求先行停战,何应钦宣称要在这“公平的合理的原则下努力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商谈”^[62]。九点中他的主张有多少,难以弄清,“有资望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何应钦的战略,想必为在和谈席上同意由中共控制未来的联合政府,但在地方行政中,设法保留国民党的势力”^[63]。张群声称,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法统地位,只会提出人民解放军渡江统一全中国,而国民党任何“领袖”对此都不能接受,因此和谈只会破裂^[13](P188)。但是,何应钦还抱有希望,要求“中共赶快指派和谈代表,提议时间与地点,准备正式开始谈判”^[56]。3月30日,他设宴为代表团饯行,对首席代表张治中说:你“劝我就任行政院长职务时,我说过,你必须负起和谈责任我才能到任,今天你要出发了,祝你马到成功,不负众望”^[64](P85)。

和平谈判于4月1日开始,焦点之一是解放军渡江统一全中国。4月5日,何应钦和李宗仁接见从北平而来的民主人士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三人转达中共“于和谈最重要、最迫切之要求:一、必须渡江;二、渡江后市长、卫戍、警察、宪兵之转移,由共党接收;三、蒋先生应付战争责任”^[2](P52)。4月6日,何应钦飞广州报告国民党中央,并“努力劝诱华南集团对于和平谈判问题与南京一致”^[65]。这遭到蒋介石反对,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等所有主战分子齐集广州出席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所谓“决不容情地粉碎何应钦的‘阴谋’”^[66]。在4月7日会议上,何应钦强调解放军很快就渡江,“政府已无望先行停战”,“取得合理和平的机会已经丧失”。陈立夫等人批评何应钦“未提及中共使者已到南京的情况,而他同李宗仁在接见使者后整夜协商”^[13](P234,235),要求何应钦报告和谈方案内容并“对其政府政策及最近和谈中的态度,发表明确声明”^[66],声称只会对李宗仁、何应钦“基于公平合理之原则争取全面的真正和平之努力,表示全力支持”^[67]。

会后,程天放、萧铮、郑彦棻等人向蒋介石报告:(1)“目前要点,对联合政府决不能承认”,但因何应钦“相当坚持,致未有结论”,只能“另电约在京诸常委到粤再议”;(2)和平特种委员会亦以何应钦坚持而“仍设立,但已确定为协助性质”^[68]。就前者来说,何应钦主张承认联合政府,因遭到CC系强烈反对而只能再议。就后者来说,李宗仁同意“设置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以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孙科、张群、吴铁城、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童冠贤为委员,由李宗仁、何应钦召集。但是,规定该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仅为“依据中央常会决定之原则,协助政府负责同志处理和谈有关问题”^[69]。如此看来,争论激烈,时人指出陈立夫等人成功“击败了何应钦”,何应钦“面带愠色,逃席而去”^[70]。因此,中共一度认为何应钦能促进和平谈判,毛泽东4月8日对张治中提出拟邀请李宗仁、何应钦等人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张治中回答李、何两人都来恐有不便,毛泽东表示何应钦暂时不来也可以。随后中共中央军委4月11日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指出包括李宗仁、何应钦等人在内的南京主和派正在团结起来“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71](P219)。

但是,按照何应钦自己所说,他在参加4月7日联席会议前几天就接蒋介石电话表示决不辜负其旨意而签订“不能合乎原则”的协定。在会上,他声称“本人一日未离行政院长职位,则必为维护国家法统和宪政体制而奋斗,决不依阿取容,失去基本立场”^[29](P105)。联席会议根据蒋介石元旦文告及迭次指示通过和谈五原则,由何应钦电告代表团遵循:“(1)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进行开始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党。(2)为保持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草所赋予之

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3)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使用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4)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5)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72](P943-944)联席会议强调:“一旦共产党渡江,和谈就中止;不能加入中共的联合政府,只能划江而治。”^[13](P235)司徒雷登就此报告美国政府:何应钦广州之行“极大地促进了”蒋介石、李宗仁之间的“了解与合作”,他带回了蒋介石集团提出的和谈条件,其核心就是反对人民解放军渡江^[13](P237)。

的确,何应钦广州之行后态度大变。4月8日,他返宁与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再度讨论。三人劝说他和李宗仁:“只要政府接受八条件中之废除宪法、废除法统之二条件,其余均无问题。”何应钦反对:“所谓废除宪法、废除法统者,即系将中华民国之名称,改为伪‘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旗改为‘五星旗’,此与投降亡国何异?”^[29](P106)在4月9日李宗仁召集的会议上,何应钦特别强调要遵守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这日会议后,何应钦提出辞职。显然,他的态度与李宗仁已不一致。

在何应钦将国民党中央通过的五原则电告代表团遵循后,张治中4月12日回电李宗仁、何应钦:虽然我方坚持不能渡江,“但共方语气亦愈趋坚决”^[73]。4月14日,张治中提出和平协定草案修正案,“将其所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指挥领导等字样概行删去”,国民党军队改编办法“亦按南京所定腹稿”及何应钦“最近指示原则提出对案。第一期为自行复员整理,第二期为两方合组整编委员会执行整编”^[74]。中共代表团尽量采纳南京政府代表团意见,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限4月20日前答复。4月16日,黄绍竑携带最后修正案回宁。

何应钦到了抉择关头。《华商报》指出决定和平谈判之关键不在谈判本身,而在南京政府、尤其是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为首脑的集团。“他们可以选择的路只有两条:或者是向美蒋靠拢,与人民为敌,和美蒋同归于尽;或者是向人民靠拢,与美蒋决裂,立功赎罪,求得人民的谅解和宽恕”^[75]。4月16日晚,何应钦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群“详谈至深夜,未作结论”。4月17日,何应钦一面再与李宗仁“恳谈并召开和谈特委会”,一面派专人携带最后修正案和其信函给蒋介石,“恳将钧旨谕知,以便遵循”。信函称:“周恩来于十五日晚最后一次会议席上申明,此协定已参酌我方所提修正意见修正之最后定案,限本月二十日前答复。如原则接受,文字上之修正可商量,但不能变更其原则。”并谓渡江势在必行,如签订和平协定,则“和平渡江”,“倘我方不接受,届时共党即宣布和谈经过及方案内容,并将破坏和谈之责加诸我方,同时即战斗渡江”^[76]。这把到底接不接受最后修正案的决定权交由蒋介石。

蒋介石遂下令“不许签字”^[7](P227)。于是,何应钦4月19日在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坚决反对李宗仁接受和平条款,蒋经国称赞何应钦对最后修正案“断然予以拒绝”^[15](P187)。何应钦在立法院临时秘密会议上解释为什么拒绝:其一,协定“根本不是一个和平协定,而是一个‘军事管理方案’”。其二,协定“把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责任,以及发动内战的全部责任,都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何负担得起”!其三,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军队,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报复,不能接受。其四,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国民党“在未来政治上,可以说丝毫没有地位”^[27](P1010-1012)。李宗仁也因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反对而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这样,何应钦同李宗仁4月20日联名给和谈代表团拍发“拒绝签字的电报”^[7](P227)。在致和谈代表转中共的电报中,李宗仁、何应钦宣称,《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未完全接受南京政府的要求,希望中共“重新予以考虑”^[13](P263)。至此,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行政院”一方面决议撤销谈判代表团,一方面发表公报宣称“‘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25](P525)。

可见,何应钦同李宗仁组织能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团,尽力支持和执行李宗仁的一些营造“祥和”政治气氛的措施;他一方面同意以毛泽东宣布的八项原则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又想按照蒋介石元旦文告所列原则寻求所谓“合情合理的永久的和平”。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然,何

应钦要拯救国民党的统治和实行“划江而治”根本不可能。他认识到此点而打算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是做不到与蒋介石决裂而拒绝接受,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

总结全文所言,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其一,国民党政府在必须进行和平谈判的背景下,必须找出既能主持和谈又能调节蒋桂关系的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对蒋介石来说,需要何应钦主持和谈以掩盖其战略撤退和缓冲蒋桂矛盾。对桂系来说,需要何应钦主持和谈,也需要他来统率蒋介石嫡系部队同桂系合作以“能战”。蒋介石把握了一个“度”:何应钦可以任行政院长,但不能兼任国防部长以指挥军队。为超出这个“度”,司徒雷登建议何应钦大胆向蒋介石提出:“(1)在国防部方面应归统一管辖;(2)将所有款项让与李宗仁、何应钦酌量运用。”^[16](P110)何应钦和桂系都做不到这一点,“能战”当然不能实现。谈判破裂后,蒋介石才在4月22日同李宗仁、何应钦等人“一致决议”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15](P188)。

其二,何应钦内阁既不能“战”也不能“和”。所谓“合情合理的永久的和平”之核心是“划江而治”。在不能取得此种“和平”时,蒋介石、白崇禧仍然顽抗到底;李宗仁可以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何应钦也想接受,但因不敢同蒋介石决裂而反接受。何应钦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想劝说国民党各派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因蒋介石的反对而改变态度,蒋介石称赞他“坚决主张‘匪军’若是过江,就是和谈决裂;乃拒绝‘奸匪’的条件,并发布召回代表团的命令”^[29](P109)。

其三,桂系以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企图重演1927年一举战胜孙传芳的历史,但是这根本不可能。何应钦在被推选为行政院长时表态,在总裁和代总统之间听命于总裁:“我们政府如同公司,我们是小股东,蒋总裁是大股东,蒋现在不做董事长,改李代总统做董事长,蒋还是大股东,但公司有大事,必定要问问大股东,这是当然道理。”^[2](P41)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掌握了行政院,也掌控了是否接受和平谈判的结果。

其四,国民党各派预想何应钦出长行政院,蒋介石与桂系之间“感情大大进步,亦就是团结大大表现”^[2](P39)。但是,随着国民党的统治即将崩溃,蒋介石、李宗仁双方之间因各自战略利益不同只能分道扬镳,何应钦根本不可能调节蒋桂关系。何应钦反而劝说李宗仁不要同蒋介石闹翻。在历史转折关头,何应钦除了同蒋介石决裂、坚定支持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并无其他道路可走。他作为国民党的“最后一张王牌”,不可能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王文隆.吴忠信日记:1949.香港: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21.
- [3] 熊宗仁.何应钦全传:下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
- [4] 林秋敏.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7).台北:“国史馆”,2013.
- [5] 李何阴谋活动,蒋仍蛮干到底.华商报,1948-11-16.
- [6] 程思远.白崇禧传.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
- [7]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
- [8] 何应钦突又患病进入医院.华商报,1949-01-10.
- [9] 李白以和备战.华商报,1949-02-02.
- [10] 何应钦到了南京满嘴“和平”.华商报,1949-02-15.
- [11] 何应钦将出任“国防部长”.华商报,1949-02-16.
- [12] 吕芳上,源流成.蒋中正日记:1949.台北: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有限公司、“国史馆”,2023.
-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ume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 [14] 李宗仁抵穗.华商报,1949-02-21.
- [15] 曾景忠,梁之彦.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 [16] 司徒雷登. 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司徒雷登日记. 陈礼颂译. 华盛顿:美国华府傅氏,1982.
- [17] 李果. 和平方案起草人谈和平. 中央日报,1949-03-05.
- [18] 程思远. 李宗仁先生晚年.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 [19] 谁代替孙科. 华商报,1949-03-10.
- [20] 张治中回忆录:下.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 [21] 程思远. 政坛回忆.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 [22] 预料何应钦将做孙科的替身. 华商报,1949-03-09.
- [23] 何应钦有电到京,组阁事愿加考虑. 中央日报,1949-03-11.
- [24] 李代总统已邀请何应钦. 申报,1949-03-09.
- [25] 周美华.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9). 台北:“国史馆”,2013.
- [2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0辑.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27]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辑委员会.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 [28] 何应钦宣布致力目标建立政治制度化. 申报,1949-03-13.
- [29] 何应钦. 为邦百年集.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 [30] 何应钦继长行政院,立院票决一致同意. 中央日报,1949-03-13.
- [31] 监院昨招待何院长,提供政治革新意见. 中央日报,1949-03-19.
- [32] 潘启元. 从何阁到阁阁. 台北“中央”日报,1949-06-07.
- [33] 监院招待会上何应钦谈组阁. 申报,1949-03-19.
- [34] 将任南京伪行政院长的第五号战犯何应钦. 华商报,1949-03-12.
- [35] 陈赓日记.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
- [36] 新阁将即向共党征询和平谈判开始期. 申报,1949-03-14.
- [37] 何应钦回到南京. 华商报,1949-03-16.
- [38] 何应钦自称跳火坑. 华商报,1949-03-19.
- [39] 何应钦由杭抵上海. 华商报,1949-03-14.
- [40] 何应钦昨由杭抵沪. 中央日报,1949-03-14.
- [41] 何应钦执行蒋命令. 华商报,1949-03-15.
- [42] 何应钦昨自沪抵京. 中央日报,1949-03-16.
- [43]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44] 内长人选费踌躇. 申报,1949-03-20.
- [45] 南京疯狂进行备战. 华商报,1949-03-20.
- [46] 甘介侯谈话. 申报,1949-03-14.
- [47] 亲往延揽阁员人选,李代总统昨晚飞沪. 中央日报,1949-03-19.
- [48] 新阁人选罗致难. 申报,1949-03-19.
- [49] 新阁今日可能组成. 申报,1949-03-21.
- [5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 [51] 新阁组成明日集会. 申报,1949-03-22.
- [52] 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程宗家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 [53] 何应钦组军人伪阁. 华商报,1949-03-22.
- [54] 新华社评何伪内阁,名单看不出求和诚意. 华商报,1949-03-24.
- [55] 政府和谈代表决定,亟盼中共早开谈判. 中央日报,1949-03-25.
- [56] 何伪内阁首次会议重新派定求和代表. 华商报,1949-03-25.
- [57] 章士钊得意忘形. 华商报,1949-03-25.
- [58] 行前竟须往溪口请示. 华商报,1949-03-28.
- [59] 黄绍竑回南京向李何有所报告. 华商报,1949-04-16.
- [60] 国民党组委员会交换对和谈意见. 和平日报,1949-04-04.
- [61] 李勇,张仲田. 统一战线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 [62] 何应钦报告“施政方针”. 华商报, 1949-03-31.
- [63] 李代总统与军事首长在国防部商大局. 申报, 1949-03-17.
- [64] 余湛邦. 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65] 何应钦今飞广州. 华商报, 1949-04-06.
- [66] 何应钦来去匆匆. 华商报, 1949-04-08.
- [67] 何应钦昨向中常会报告当前三大问题. 中央日报, 1949-04-08.
- [68] 蒋中正革命文献—国共和谈, 蒋中正档案. 台北: “国史馆”藏, 典藏号: 002-020400-00030-001-031.
- [69] 蒋中正革命文献—国共和谈, 蒋中正档案. 台北: “国史馆”藏, 典藏号: 002-020400-00030-001-029.
- [70] 陆雨. 何应钦在穗的时候. 华商报, 1949-04-16.
- [7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8 册.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 [72]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七编战后中国(二).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 [73] 蒋中正革命文献—国共和谈, 蒋中正档案. 台北: “国史馆”藏, 典藏号: 002-020400-00030-001-034.
- [74] 蒋中正革命文献—国共和谈, 蒋中正档案. 台北: “国史馆”藏, 典藏号: 002-020400-00030-001-036.
- [75] 社评. 赶快和美蒋切断联系. 华商报, 1949-04-16.
- [76] 蒋中正革命文献—国共和谈, 蒋中正档案. 台北: “国史馆”藏, 典藏号: 002-020400-00030-001-038.

Ho Ying-chin's Assumption of the Premiership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Beiping Peace Talk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PC

Zhang Ha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eld in Beiping in 1949, Ho Ying-chin was seen by the Kuomintang as its "last resort" to salvage its collapsing rule. To facilitate their "war preparations coupled with peace overtures", the Chiang Kai-shek clique and the Kwangsi clique sought out Ho Ying-chin, who was both acceptable to them and to CPC, to serve as premier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Kwangsi clique believed that cooperation with Ho could replicate their previous victory over Sun Chuanfang, while Chiang Kai-shek thought he could maintain control over the peace process via Ho. In for a bid to secure a "reasonable peace", Ho spared no effort in cobbling together a "peace" cabinet and a negotiation delegation, while also drafting key points for the negotiation proposals. Given the inexorable course of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o was ultimately unable to secure a "peace deal" predicated on "rul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hile mediat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hiang and Kwangsi cliques. Ho was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break away from Chiang Kai-shek clique and accept "*the Domestic Peace Agreement (Final Amended Version)*". Ultimately the Kuomintang's attempt to use Ho as the "last resort" to salvage its collapsing rule proved entirely unattainable.

Key words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 Ying-chi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Kwangsi cliques; "reasonable peace"

■ 作者简介 张 皓,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湖北 武汉 430074。

■ 责任编辑 桂 莉